

封锁长城的热河日本宪兵队

傅大中

“西南肃正”在1942年至1944年达到了高潮，其中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1943年最为残酷。当时受害最重的是承德、滦平、丰宁、青龙、兴隆5个靠近长城的县。这场大规模的武装镇压的最高指挥者，是关东军西南防卫军司令官。主要参加者有日伪军、警、宪、政、协和会五部分，人数在30万以上。这场讨伐中，日伪方面搬用了对通化地区讨伐的经验，并把参与策划通化地区讨伐的主要罪魁，都调到这一地区指挥讨伐。在通化大讨伐中罪恶累累的程斌、唐振东等8个通化警察大队，全部被调到热河，改编成热河警察大队，伪满宪兵总团也临时从各地抽调宪兵编成“西南特务宪兵队”。

承德宪兵队也根据讨伐的需要，改变了机构。除原设的各分队、分遣队继续保留外，1943年1月，又从作战部队抽调数百名“补助宪兵”，与宪补、宪兵补编成3个宪兵游击队，每队120余人，下设3个小队、9个分队。从全伪满挑选政治镇压经验丰富的宪兵干部出任队长、分队长。当时第一游击队长是“闻名”全伪满的日本宪兵中尉长岛玉次郎，他以古北口宪兵分队长身份指挥第一游击队在承德、滦平、兴隆等县活动，主要目标是镇压中共滦承兴县委；第二游击队以承德宪兵分队长生田为首，活动在承兴两县交界的半壁山地区，以镇压中共迁遵兴县委为主要任务；第三游击队以喜峰口分队长笠井神夫为首，重点活动在在青龙县内，以镇压中共迁青平县委为主要活动目

标。

1944年3月，日军调整了热河的兵力部署，从华北调来一个师团，接替热河独立守备队，进热河地区进行讨伐。该师团长接任西南防卫军司令官后，根据热河地区的特殊情况，把华北特殊警备队的组织活动方式移入到热河，重新改组了热河的宪兵组织。

首先他将承德宪兵队原有的承德、青龙、喜峰口、赤峰、平泉、古北口5个分队的兵力压缩，使其专门担当军事警察业务。同时在交通要道，“治安不良”地区的茶棚、宽城、双山、峪耳崖、琉璃庙、白城子、马兰峪、叶伯寿、上谷、凌源等地设立了宪兵分遣队，由承德宪兵队本部统一指挥，配合宪兵特别警备小队活动，这些宪兵派遣队以后都改编成宪兵分遣队。

同时，又将3个宪兵游击队编成8个特别警备小队，每队50人，下设3个分队9个组，全部改成轻装，专门对付八路军的小股部队和中共地下县委的干部。1944年改编后的宪兵特别警备小队配备情况如下：

第一小队：队长 承德分队长笠井神夫中尉兼，主要活动在喀左旗和凌源地区。

第二小队：队长 古北口分队长长岛玉次郎中尉兼，主要在喀中黄土梁子一带活动。

第三小队：队长 赤峰分队长百鸟少尉兼，主要在青龙县、宽城子地区活动。

第四小队：队长 青龙（喜峰口）宪兵分队长佐佐木宪兵少尉兼，在青龙地区活动。

第五小队：队长 青龙宪兵队附高山准尉兼，在青龙县双山子一带活动。

第六小队：队长 平泉宪兵分遣队木下宪兵准尉兼，在喀

左、宁城地区活动。

第七小队：队长 承德宪兵分队附仓岗准尉兼，在承德地区活动。

第八小队：不清楚。

1943年6月，承德宪兵队特高课长木村光明，还与西南防卫军参谋、热河省警备厅特高科长、协和会事务等人，共同策划了对“家理教”的收买活动。历史上由于热河地区是蒙汉民族杂居区，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导致“家理教”、“红枪会”一类邪教团体在这一地区民众中有相当的影响。承德宪兵队为利用这些邪教团体配合讨伐和镇压活动，决定对其进行收买，结果承德宪兵队将“家理教”的20余名头目都收买成特务班长，责令热河省协和会和警务厅为其提供经费，指挥他们大力发展教徒，以此搜集八路军和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情报。

“西南肃正”期间，日伪警宪配合军事讨伐，在这一地区疯狂地进行搜捕、抓人，制造了无数起血案，承德宪兵队便是其元凶罪魁。承德宪兵队直接参与指挥的重大血案有：

一、半壁山地区的三次大逮捕

半壁山地区位于兴隆县东南部的五指山下，是八路军晋察冀第十三分军区在冀热边开辟的五指山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939年这一地区就是敌后游击区。1940年3月，中共迁遵兴联合县委成立后，领导该地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在这一地区，村村都有中共的基层组织，大部分村庄都建立了两面政权，少数村庄还建立了抗日武装，抗日民众配合敌后政权征粮征物，转储物资，坚壁清野，配合主力部队破坏日伪的交通，传递情报，开展游击战争。因此，这一地区也成了“西南肃正”中日伪讨伐的重点。在1942年、1943年、

1944年三个春节，承德宪兵队在日伪军警的配合下，利用中国人民在家过春节的民族风俗，连续进行了3次大逮捕，据统计有1890名群众被捕，数百人被处死。

1942年旧历腊月二十五开始的第一次大逮捕，是喜峰口宪兵分队直接指挥的。在此之前，喜峰口分队指挥伪半壁山警察署派出大量便衣特务潜入到这一地区，对抗日家属、区村干部、进步人士、接近八路军者、积极交公粮的人等进行调查，之后在大批日伪军警的配合下，将这一地区的各个村庄包围，宪兵按名单抓人，然后送兴隆特别治安庭审判。这次镇压相当残酷，共有五六百人被捕，近百人被处死。余者多被课以重刑后，押到东北各地做劳工。第二次大逮捕是在1943年旧历腊月二十九至正月初一进行，逮捕的方式和第一次相同。由于这一年是“西南肃正”最残酷的一年，因此这次在半壁山地区的逮捕也最为残酷，有九百多人被捕。锦州特别治安庭派出人员在当地设置“临时治安庭”，随抓随开庭审判。不出数日，即有百余人被一审判处死刑，由宪兵和警察就地举行集体屠杀。第三次大逮捕是在1944年旧历腊月二十八到正月初四进行的。在这次大逮捕中，敌人采用了和前两次完全不同的作法，见到中国人就抓，尤其是在靠近长城的新杖子、冷嘴头、赵杖子等村最为残酷，其中仅新杖子一村就有100多人被捕。这次大逮捕，半壁山地区数十个村庄无一幸免，共有一千三四百人被捕。

据当地调查证实，日本帝国主义在这一地区的屠杀暴行令人发指，被杀绝斩尽的不下几十户，上至六七十岁的老人，下至不满周岁的儿童，以至哑巴、残疾人都无一幸免。由于屠杀在兰旗营村造成了“万人坑”，在大莫峪村造成了“寡妇庄”，1944年以后，这一地区成了无人区。

二、九虎岭惨案

九虎岭村位于青龙县西部的迁青平抗日根据地内。1941年以后中共冀东党分委领导下的迁青平联合县委经常在这地区活动。在九岭虎岭村中有一个仅有30来户的小庄叫九虎岭庄，1942年7月和1943年1月，曾两次受到日寇的血洗，数次遭到劫难，其中1943年1月的一次最为悲惨。

这年1月，喜峰口宪兵分队宽城子派遣队的密探侦知，八路军迁青平县委正在九虎岭村开会，承德宪兵队长收到喜峰口宪兵分队长的报告后，鉴于这一带抗日武装的强大，遂立即从承德、古北口两地调集了100余名宪兵，加之喜峰口分队的60余名宪兵，联合组成搜索队，在本部特高课长木村光明的带领下，连夜便装将九虎岭庄包围。由于县委干部撤走，宪兵遂对民众采取了残忍的报复手段，抓捕了19人，将14人当场杀害。其残害的手段令人发指：有的被打碎下颌致死；有的被按在地上挖去双眼；有的被挖去心；有的被塞进冰窟窿；有的用三角尖木棍穿透胸膛钉在地上钉死。宪兵在过堂审讯时，使用的手段更加残酷：有的被烧红的烙铁烙掉了鼻子，有的被烙得露出了天灵盖骨；不仅对成年人如此，对未满周岁的婴儿也不放过，村民刘文振8个月的小孩，被日本宪兵从其母亲的怀里夺去，活活摔死。由于日寇的残暴杀戮，这个仅30来户的小村庄就绝户了7家。

三、“二·一”惨案

“二·一”惨案是1943年春节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在今河北省承德县鹰手营子、南双庙、三道河子、大杖子、东涝洼、苇子岭等14个村庄制造的一起骇人听闻的大惨案。承德宪兵队宪

兵，驻下板城日军讨伐队和伪承德县警务科警务讨伐队分三股以清乡为名，同时将上述14个村庄包围，上千人被捕，数百人被判刑，254人被残杀致死。在这次惨案中，由于亲人被害造成孤寡愁病、无法生活而死去者又达600多人，遭劫后的14个村庄，有近60户人家死绝；致伤、致残者更是无法统计。这一带是家家有血恨，户户有怨魂。

“二·一”惨案发生地，位于承德南部的五指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内，这里从1938年起就是八路军的敌后抗日游击区，14个村庄的人民为抵御外侮，很早就参加了抗日活动。1940年以后，这里属中共迁遵兴联合县委第十三区管辖，是雾灵山抗日根据地与冀东抗日根据地秘密联络的一条交通要道。

1943年初，十三区抗日干部在胖和尚村开会时被日寇讨伐队包围，突围中区文书高云峰同志不幸牺牲，身上携带的各村干部名单被敌人得到，“二·一”惨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承德宪兵队是这次惨案的最大罪魁祸首，在逮捕前，特高课长木树光明将各地活动的近600名宪兵、宪补、宪兵补和补助宪兵集中到了这里，在1月31日晚和2月1日晨分别将14个村中的7个重点村庄包围，上至60多岁以上的老人，下至15岁的少年，只要是男人都三五个用绳子捆在一起，按掌握的村干部名单抓人，然后追查谁给八路军送过公粮，做过鞋，传过信，站过岗。经过四五天的血腥拷问后，2月6日（大年初二）将一部分认为是重点的人物押送到承德监狱，一部分押到新杖子村东头杀害，杀害时还拉去了很多人陪绑。其余的青壮年都押送到东北各地当劳工。承德宪兵队搜捕的7个村庄中，以鹰手营子、东涝洼、南双庙3个村最惨，其中东涝洼村在2月1日被抓到新杖子的129人中，有2人被当场杀死，74人被押到承德处死和判刑，被判刑者光复后仅有17人有幸生还。全村共120户人家，死绝了

20户。南双庙村被押到靳杖子的110人中，85人被送到承德审判，其中6人被判死刑，1人被刑讯打死，余者被判刑后送到本溪、丹东、阜新当劳工，光复后仅有8个逃回，其他人全部葬身他乡，全村80户人家，死绝了14户，400多口人剩下不到一半。鹰手营、南双庙、东涝洼村成了当地闻名的“寡妇村”。

“西南肃正”期间，承德宪兵队除直接参与制造了上述几起大惨案外，在最残酷的1943年还指挥了全热河的日伪警察，两次对中共地下组织和外围团体进行了大逮捕，敌人将这两次活动称之为“剿抉”工作。据伪热河省警务厅长皆川富之亟向伪警务总局长山田俊介的报告：第一次大逮捕是在9月11日到9月27日进行，主要对象是承德东南部和兴隆县东部的迁遵兴联合县委；青龙县西部的迁青平联合县委；青龙东南部的青绥凌联合县委和平泉西南部的承平宁联合县委。由承德、古北口、喜峰口分队和平泉分遣队分别指挥上述4个地区的伪满警察、伪满宪兵、铁警在日伪军的配合下进行。第一次“剿抉”总共逮捕了958人，其中456人被送伪法院判刑。第二次大逮捕是在10月6日到10月19日进行，这次除继续在第一次逮捕的地区重新逮捕外，喜峰口分队还将逮捕范围扩展到了长城以南的迁安县滦阳、铁门关和碾子岭等地区。第二次“剿抉”总共逮捕了292人，其中68人被送到伪高等法院判刑。

“西南肃正”中，日本帝国主义采取的是军、警、宪、特、行政、司法、协和会等机构联合镇压的办法。伪锦州省高等检察厅和高等法院配合讨伐，在热河很多地方设立了“临时特别治安庭”，对逮捕的抗日军民随时起诉，随时开庭，一审判决。当时伪锦州高等法院在讨伐最残酷的青龙、宽城、喜峰口、平泉、半壁山、鹰手营子等地，都开设过“临时特别治安庭”，审判后将判处死刑的人，随时交给当地日本宪兵就地屠杀。

“西南肃正”中，日本法西斯为彻底割断人民群众和八路军的血肉联系，疯狂地推行了“集团部落”政策，热河的广大地区被划成无人区，严禁老百姓进入。1943年以后，承德宪兵队还编成了宪兵游击队，在长城两侧的无人区进行游动搜捕，发现有人脱离“集团部落”进入无人区活动，就当即杀死。下面是日本和歌县人岛津酉二郎于1954年8月16日，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一段供述。他1942年来到中国，1943年时是承德宪兵队所属长岛玉次郎部下的第一宪兵游击队宪兵伍长，他说：

“1943年11月15日，我们长岛游击队第一小队在河北省密云县兵马营西北方活动，逮捕了1名怀疑是八路军联络员的行商，我对其进行了审问，该商闭口不答，小野曹长当即命令我等7人对其刑讯拷打，我将这名行商打倒后，用他自带的扁担压在他脖子上，用脚踩着两头，一直把这个人压死。”

“1944年2月20日，我们在密云县东南地区活动，夜12点左右，见有一农民在耕田，长岛队长认为此人在夜间耕田稀奇，可能是八路军的联络员，故命令将其逮捕杀死，当我持刀去砍杀时，该人已被别人砍倒，正在痛苦挣扎，我又连砍了几刀，将该人杀死。”

“1945年6月，我们在遵化县马兰峪南搜索时，发现了一对新婚夫妇，我指挥部下将他们逮捕先打成半死状态，然后将男的拉到田中用军刀杀死，女的交给新兵练刺杀，但女的用手抓住刺刀不放，新兵不能刺中，于是我上前将这个女人摔倒，用军刀砍了她的脖子，将她斩杀。”

从这个宪兵伍长血淋淋的供述中，就可想而知宪兵在热河地区的残忍凶暴。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按计划承德宪兵队和特务机关要被改编成关东军第3特别警备队第6大队，准备配合关东

军第4方面军阻击从外蒙和中苏西部国境进入东北的苏联红军，为关东军主力撤至通化、朝鲜一线后，在苏军占领地开展游击战。但由于苏军迅速进入东北，承德宪兵队还未来得及改编完，就随日本投降而被解除了武装。

兴 隆 惨 案

朱星云

一、大灰窑惨案

在兴隆县城南土门东山的山坳里，有一座象山丘般的坟墓，这就是日本侵略者用枪弹和刺刀一次杀害我一百二十多名无辜同胞，用尸骨堆起的“肉丘坟”。

1942年1月，兴隆县的抗日斗争，由深山区扩展到平川，直至县城和敌人据点附近。我抗日军民经常出没在县城和敌据点附近，秘密投放《救国报》和抗日传单，宣传我党抗日主张，鼓舞群众斗志，分化瓦解敌人，扰得敌人坐卧不宁，心神不安。伪兴隆县日本副县长西山密令宪兵、特务和警察四出活动，加紧在县城附近戒备巡逻，随时搜查可疑之人，抓捕入狱。

2月1日，正是农历腊月十六，逢兴隆县城的集日，有成千上万的人去城里赶集，准备过年。这天县城里的宪兵、特务和警察也四处活动，遇有可疑之人，即抓捕入狱。有个名叫马祥瑞的农民，从兴隆城东大灰窑沟里走出山来去县城赶集，刚行至小东区村边，就看到驻在天主教堂院内的一伙特务，在拦路搜查赶集的人。马祥瑞这天身上带有几十元钱，用一张旧报纸把钱包好，藏在腰中准备进城买些过年物品。他怕被特务们搜